

从文化反哺到底层污名

——建国以来的城乡关系与“小镇青年”叙事衍变

付蕾 沙垚

摘要 随着中国三、四线城市电影院线的建设以及乡镇观影人数的增加,“小镇青年”成为了近年中国电影市场颇受瞩目的受众群体。围绕小镇青年观影品味的争论持续发酵,其背后是电影人和影评人对于中国电影“媚俗”的焦虑。当群众观影的正当性被置于雅-俗的二元逻辑中,小镇青年不得不为电影艺术性的下滑背锅。从大众文化史的视角来看,小镇青年所处的社会结构与阶级结构在历史大潮中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本文旨在通过爬梳1949年以来有关小镇青年的叙事衍变,以发掘不同时期文化结构中不断变化、调整的城乡阶级关系。通过这样的历史性回溯,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把解锁当代城乡不平等关系的钥匙。

关键词 小镇青年;城乡关系;大众文化史研究;底层叙事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 付蕾,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62;沙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102

DOI:10.15897/j.cnki.cn51-1046/g2.2018.06.007

近年来,“小镇青年”在荧屏内外都颇受瞩目,甚至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自2012年起,中国三四五线城市的电影市场份额逐年增加,至2015年达到36.32%^[1],尤其是在《捉妖记》24.39亿的票房中,小镇青年贡献了81%。^[2]因此,有学者认为小镇青年书写了当代中国电影的票房神话,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主力。^[3]但票房贡献并没有为小镇青年树立作为观影主力的正当性,在影评人眼中,小镇青年一度沦为低级趣味的代名词。有影评人认为,小镇青年应该为中国电影的在艺术和审美上的堕落负责,是他们使电影这门“昂贵的艺术”变成了“低廉的消费物”,充满媚俗性与“屌丝”色彩。^[4]

在电影市场的蓝海面前,作为受众主体的小镇青年被建构为电影艺术性下滑的推手,类似的逻辑还出现在了今年贺岁档冯小刚的一句“观众是敌人”中。现实中,对于电影观众的量化、分类研究尚显匮乏,电影创作者恐怕难以准确定位自己的受众群体,往往是在所谓的“现象级”影片诞生之后,才马后炮地进行相关的受众分析。因此,批评小镇青年观影品味的影评人和创作者难免面临着如下尴尬:在电影产业化、资本化的影响下,一些创作者已经脱离于观众和日常生活,他们对潜在的电影受众知之甚少。尹鸿在《2015年中国电影产业备忘录》中,将“小镇青年”定义为“二三线城市及以下城市、县城、乡镇观众”,其“年龄在19-30岁之间,多数为专科学历,收入5000元以下”,“更容易接受接地气、叙事朴实、与自己成长经验相关的作品;更爱看喜剧电影,更偏好

国产影片”。^[5]这样宽泛的定义正说明了“小镇青年”作为概念或观影人群的歧义性与模糊性。

布迪厄在谈论趣味的时候,认为社会的合法趣味总是统治阶级的趣味。^[6]蔡翔进一步提出,并不存在真正的高雅趣味和低级趣味,其关键在于“趣味”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7]作为观影主体的小镇青年并非构筑票房神话与电影品质负相关的中介,而更似电影市场化、资本化运作中被消费主义迷雾所操控的玩偶。当“消费能力”成为个体社会等级的重要标签之一,被物化的受众只得走入资本主义物体系,用占有物质与资源的能力证明自己的社会存在;但物质消费水平并非社会分级的唯一标准,文化消费同样是社会分级的利器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对于生活略有盈余、刚刚具有文化消费能力的大量乡镇人口来说,他们的社会上升将再次被文化品味、审美趣味挡在门外。想要继续攀爬社会等级阶梯的群体只得向所谓的“中产”、“精英”品味看齐,进行下一轮远超于大众消费水平的文化投资。这就是资本通过品味驯化受众的过程。在当代中国,这是城市中产阶级崛起过程中秘而不宣的事实。

因此,毋宁说小镇青年在当代被发现不是偶然。借用马克思的逻辑,“小镇青年”在历史与当下的“目的”和“任务”已经“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了”一个阶级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社会的整个结构”^[8]。

五四以来,“青年”一直被赋予正面价值,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发刊词中写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於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於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毛泽东也有一句传播甚广的讲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与这些旧时的、充满正能量的叙述相比,当下部分影评人、创作者正不断用他者化的视角对小镇青年进行污名化。与其说这种污名化是少部分文化精英的偏执使然,不如说小镇青年所处的社会结构与阶级结构在历史大潮中已经悄然

发生了变化。因此,本文旨在通过爬梳1949年以来有关小镇青年的叙事衍变,以发掘建国以来不同时期文化结构中不断变化、调整的城乡阶级关系。概括而言,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建国初乡土文化被赋予了反哺都市文化的功能,乡村青年代表着文化的未来;到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物质生产的日益丰饶,以生产为中心的乡村生活与日益抬头的城市消费主义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小镇青年的文化陷入了方向的焦虑;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成为了新的合法性叙事,早期革命叙事中乡土文化的合法性地位摇摇欲坠,此时,在城乡之间流动频繁的小镇青年呈现出失落与救赎并存的二重性;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乡村与小镇被定义为底层,在这套话语中,小镇青年的文化是底层文化,其身份自信与精神救赎被彻底消解……

因此,本文将社会主义各个时期城乡关系的特点与有关“小镇青年”的叙事勾连起来,旨在透过“小镇青年”这一群体的形象变迁,进一步回溯各个文艺作品中关于城乡关系的叙事,以及这些叙事背后的社会动力。通过这样的历史性回溯,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把解锁当代城乡不平等关系的钥匙。

一、解放的想象

1950年代早期的电影、小说、戏剧中,农村与乡镇青年呈现出了与当下媒体纪录的“小镇青年”完全不同的辽阔气象与精神风貌。一方面,“青年”被描述为新文化、新生活、新风气的开创者与实践者。另一方面,农村、小镇作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原乡,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作为政治与文化主体的地位被进一步巩固;而城市,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被迫开阜通商的都市,在《霓虹灯下的哨兵》等影片中,往往被塑造成受到资本主义文化腐蚀而亟待改造的空间,城市因而往往成为敌特类影片中敌人与危险潜伏其中的空间。因此,乡镇在文化和道义上处于截然不同于城市的优越地位。虽然1950年代早期电影、文艺作品中并未着力刻画和突出“小镇青年”的形象,但是社会主义文艺叙事的内在逻辑使乡村、小镇、农民

阶级获得了革命的合法性与道德的高尚性。

比如,在《婚姻法》宣传普及的过程中,“小镇青年”尤其是乡镇与农村青年妇女身上的探知并实践时代敏感变化的特质,以及这种“敢为天下先”的性格,在电影、报纸等大众媒体中得到了较好的塑造与传播。1950年《婚姻法》颁布之后,众议纷纷,一些抱有封建婚姻观念的群众和干部把《婚姻法》说成是“离婚法”,是“拆散人家法”,是在“提倡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等,婚姻与自由俨然被对立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报纸上一系列关于农村青年妇女摆脱封建婚姻关系、勇敢追求并再次获得个人幸福的故事,使得“婚姻-自由”做为对立的两个极端最终统一起来。以农民自由婚恋为题材、宣传《婚姻法》的电影《儿女亲事》《两家村》《小姑贤》于1950年后相继拍摄放映。5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地方戏剧振兴而先后拍摄的《刘巧儿》(1956年)、《罗汉钱》(1957年)、《李二嫂改嫁》(1957年)、《借年》(1957年)等反映婚恋自由的电影,不仅向农民普及婚姻法教育,同时也使得一批积极追求个人解放的“小镇青年”深入人心。

究其原因,在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中,“青年”是革命的推动性力量。毛泽东认为:“中国青年们……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9]“工农青年、知识青年和部队中的青年,他们英勇积极,很有纪律,没有他们,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就不能胜利。”^[10]具体到文学作品中,首先,长期以来青年尤其是青年妇女都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而革命首先是解放的,因此青年被叙述成现代的、革命的力量;其次,青年暗含着“成长”的主题,更容易成为被教育的主体,因此往往会以“领路人”的形象在文艺作品中出现。^[11]

在文化维度上,革命的、先进的乡土文化、青年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与价值体系的创建齐头并进,不断反哺着尚待改造的城市文化以及曾长期浸泡在资本主义文化中的人群。因此,村镇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被社会主义文化发掘、借用并再生产,文艺作品中的乡村生活是美好的、朴素的、温情的,包含着集体主义的价值

诉求。如果说新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内置和预设了某种“城市中心主义”的逻辑,那么1950年代中国的文化与宣传系统中对“乡村”、“青年”的颂扬则在社会主义文艺的向度上维持了城乡间的平衡发展。比如评剧《刘巧儿》中就有一段曾经风靡全国的唱段:“巧儿我采桑叶来养蚕,蚕做茧儿把自己缠。恨我爹他不该把婚姻包办,怨只怨断案不公拆散了姻缘。”而对美满婚姻生活的想象是:“过了门,他劳动,我生产,又织布,纺棉花……争一对模范夫妻立业成家呀。来在了桥下边我用目观看哪,河边的绿草配着大红花呀。河里的青蛙它呱呱呱地叫哇,树上的鸟儿它是唧唧喳喳呀。我挎着小筐儿忙把桥上啊,合作社交线再领棉花。”

二、焦虑的初现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落幕,新中国达成了初步工业化的目标,建国早期关于小镇青年的叙事仍在延续,但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一方面,小镇青年被建构为解放的、现代的文化主体,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对现代文明流露出憧憬和向往;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先进的科技、现代的机械、丰裕的物质首先会在城市出现。这种矛盾带来的客观效果是,1960年代的中国,变得日益“现代”,不仅包括基本确立的现代工业体系与城市生活方式,“同时基本确立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文化导向”^[12],并成为小镇青年热衷于模仿的“时尚”。这时候,1950年代的小镇青年身上的文化自信和现代表征被冲淡了。

蔡翔在论述1960年代因物质丰裕带来的焦虑时,引用了两个案例,比如在《年青的一代》中,林育生开始喜欢“几个罐头和一些点心”、“连衣裙”、“生日聚会”等等这些“洋里洋气”的东西。在《千万不要忘记》中,丁少纯开始穿“皮夹克”、“西服”、“毛料子”,他喜欢这些代表“现代”、“工程师”的生活方式的文化符号。问题在于,这些符号并不是从“无产阶级生活方式”或者“社会主义文化”中“土生土长”出来的,其背后是另一种“物体系”,是消费主义,甚至资本主义的价值

观。^[13]

因此,在1960年代的小镇青年陷入了分裂与焦虑中。事实上,官方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将之视为帝国主义通过物化中国青年,达到“和平演变”中国国家性质的一种方式,上升到“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14]来讨论。主流话语解决该问题的办法是调动1950年代的文化资源,尤其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积累的、被青年大众所认可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来进行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比如罗瑞卿在1965年出版的《青年英雄的故事(续编)》的前言中强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阶级斗争”、“艰苦奋斗”、“不怕苦、不怕死、不怕天、不怕地”“胸怀祖国,眼观全球”、“甘当革命事业中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关心人民胜过关心自己”、“爱护国家利益超过爱护自己的生命”。^[15]

这种话语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呈现。比如1964年发表的话剧《千万不要忘记》,青年工人丁少纯受到了以岳母为代表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腐蚀,开始追求物质享受,工作态度和积极性都受到了影响。在经历了一番波折之后,从乡下进城来的爷爷及时出现,最终批判并点醒了青年工人:“孩子啊,我的孩子!难道你真的忘了你是个什么人吗?你的祖父是个老雇农,你的父亲是个老工人。”显然,这里是调动了“阶级身份”、“不忘本”苦难记忆与历史叙事,来完成对城市物质消费和交换的批判。不仅如此,正如罗瑞卿所说:“青年同志们,未来是属于你们的,努力奋斗啊!”^[16]依托已经获得的政治权力,作为坚实后盾,调动对美好未来的想象,是应对1960年代焦虑的另一种有力方式。丁少纯父亲丁海宽说,“我们总有一天,能让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都穿上最好的衣裳!可是现在,世界上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连最坏的衣裳都穿不上!……要是你们(丁少纯与妻子)光想着自己的毛料子,光惦着多打几只野鸭子,那你们就会忘了关电门、忘了上班,忘了我们的国家正在奋发图强,忘了世界革命!”

但是,这种与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逐渐脱节的文化符号、价值观念,以及对未来的想象,是否

足够化解“物体系”与消费主义对小镇青年的影响?

三、失落与救赎

1970年代,在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中,政治动员使得青年群体在城乡间不断流动,政治的介入,持续赋予乡村、小镇在文化和道德上的进步性和正义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因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城乡二元分裂。但是到了1980年代,随着政治与阶级话语的褪去,小镇青年所代表的诸如现代、先进、解放等等的文化符号也随之逐渐消解。

在《人生》的主人公、“小镇青年”高加林身上,一方面,我们还能看到谈论时事政治、国家大事给他带来的满足感和自豪感;另一方面,在努力摆脱小镇出身,获取城市身份,却被人告发,重返乡土之后,高加林“趴在热情的乡土上大声痛哭”。这暴露了他内心深处那种“农村人低人一等”的认知,以及对小镇的身份自信的失落。

1980年代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与乡村集体经济的解体,中国“村-镇-城”之间出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推动物质生产的同时,文化上的碰撞亦是深刻而激烈。“小镇”成为有待开发的文化想象空间,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被更多的文艺与影视作品所关注,大量在村镇和县城有过生产生活经历的青年群体开始成为文艺作品中的主角或典型人物。“走出去”还是“留下来”逐渐是“小镇青年”的重要人生选择。但无论能否脱离农村户籍,精神上的“走出去”都是必经之路。与外界的精神联系使“小镇青年”的个人选择与20世纪革命中的世界主义精神建立了某种勾连,冲淡了日常生产生活的艰辛与曲折。

雷达这样评论故友路遥笔下的小镇青年们,“(他们)大都是物质上的贫穷者,精神上的高贵者,外在的贫困和内心的高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17],“往往吃的是窝窝头,卖的是苦力,却看的是《参考消息》,向往的是联合国的讲台”^[18],如《平凡的世界》主人公孙少平说,“总有一天,我要扒着火车去外面的世界”。从将黄面馍、黑面馍、白面馍直呼为“亚非拉”,到搜集并阅读《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牛氓》等中外名著,再到积极投身农业生产与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中去,路遥笔下“小镇青年”的精神世界始终与外部变化、与世界紧密相连。路遥的书写不是孤案,孟登迎在分析1983年黄蜀芹导演的《青春万岁》和1985年张暖忻导演的《青春祭》时认为,1980年代的青年,尤其是与乡土社会有关系的青年,虽然都有青春感怀的情愫,但依然“重视展现人民性和青年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19]。

以少安与少平的个人活动为主线,“小镇青年”们游走在城乡之间,灵活挪用各种城乡资源为己所用,他们投身家乡建设的个体实践弥合了时代的裂痕以及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割裂式发展,让更多人看到土生土长的中国青年是如何主动迎接、适应并拥抱大时代变化。

这便形塑了1980年代“小镇青年”的形象,虽然不再有诸如1950年代的身份自信与文化引领,但他们依然葆有热情、朝气和对未来的想象。胸怀着革命与社会主义理想抱负的“小镇青年”与日益堕落的时代和社会进行着艰难的斗争。

四、被遮蔽的主体

在1980年代文艺界逐渐自由化与去政治化的氛围中,来自农村或小镇的青年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底层”,在这里,“青年”的能指和所指都不见了,尤其是1990年代,流动进入城市的“底层”,在文艺作品中,不再对知识充满渴求,不再对未来充满理想。

在何继青1993年的小说《军营股民》中,进城务工的打工青年,成百上千地排队购买股票,梦想一夜暴富,面对这种不劳而获的金钱获取方式的诱惑,毫无抵御能力。赵月枝研究1990年代的都市小报时,引用了一些事实,比如“兽性丈夫切下妻子的鼻子和脸颊来下酒”,“丈夫为他做妓女的妻子拉皮条”,“母亲协助她做妓女的女儿勒索嫖客”等等^[20],无论是小报故事的主角,还是观众,都以流动的进城务工青年,即所谓的“底层”为主体。

“底层”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的存在”^[21],与“底层”相对的是“上

流社会”和“精英社会”。因此,底层问题是“现代性叙事的最大的裂隙。这个群体的存在时刻提醒着人们,所谓的现代化正在制造着被完全抛弃的人群”^[22]。

用产生于后殖民资本主义语境中的“底层”来替代改革开放时代的进城“农民工”,农村或小镇的“青年”等概念,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置身于中国革命现代性及其历史发展的轨迹之外,并以一种隔岸观火的方式”^[23]考察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所遮蔽的正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换言之,在1990年代,通过“底层”概念,彻底解构了来自农村或小镇的青年所内涵的身份自信、文化主体、未来想象、精神救赎,以及与革命的关系。

新世纪,随着三四线城市商业地产的开发,中国电影产业化的脚步触及了更广大的小镇人群,投资者发现“小镇青年”成为观影的主体。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在“底层叙事”切断了与历史叙事的联系,以及“自我东方主义”话语盛行的时代语境下,“小镇青年”也就自然而然被塑造成一群具有一定消费能力,而又趣味恶俗的文化他者。来自城市的“剧场”“影院”“博物馆”代表着一种时尚,而“小镇青年”努力地向往并消费着这些文化符号,但他们依然是他者。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新世纪,与“底层”同构的“小镇青年”,尽管他们贡献了中国电影票房的半壁江山,却不可能获得一个光辉正面的形象。可以说,“小镇青年”形象是当代城乡关系的表征,它充分说明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已经从政治经济结构蔓延到了文化领域。

五、结语:未完成的进行时——“小镇青年”的时代使命

本文通过爬梳历史不同阶段小镇青年的形象和叙事的变迁,希望从历史中寻找话语资源,尝试着去突破当代“小镇青年”的叙事藩篱,进而重新发现真正的作为主体的小镇青年。

建国初,乡村、小镇和青年都是正面的形象,是“领路人”和“排头兵”。到了1960年代初,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城乡之间的裂痕逐渐扩大,青

年越发向往城市的物质和消费,但这时候的乡村和小镇依然在文化上依然保持着自信和优越性,并作为解决城市“堕落”的方法而存在。1980年代初,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大批流动人口进城务工,乡村和小镇的文化自信不见了,且逐渐成为落后的代名词,但是在文本中,城乡之间流动的“青年”用身上的朝气、理想和世界主义的情怀,努力地弥合着城乡之间的裂痕,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作为一种时代的救赎而存在。直到“底层叙事”兴起,来自农村和小镇的“青年”沦为底层,他们整天为了生计发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没有任何优越性可言,青年话语与革命话语的关系被割裂,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线性的现代性的消费主义话语。

沿着城乡关系和青年话语两条脉络梳理历史,总体上,我们发现,城乡关系日益不平等,这也就必然造成青年叙事中积极性和价值感的彻底旁落,直至被妖魔化和污名化。因此,小镇青年的话语背后,是文化领导权的争夺。

造成的结果是,“小镇青年”成了永远的异乡人。半个世纪以来,来自农村和小镇的青年,已经逐渐认同城市文化,日益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甚至许多小镇青年依凭自身努力,已经在都市扎根,但他们仍旧因为出身以及文化差距怀有一种自卑感,加之中国尚不灵活的户籍制度以及由此引发的买房、子女教育等诸多限制,户口与出生地仍然是社会等级划分的标准之一,这些小镇青年由此成为了“都市异乡人”。音乐与舞台上关于“都市异乡人”的歌咏与呈现恰恰反映了新时期人们独特的文化心理。可以说,“小镇青年”的语词本身就反映并参与建构了这种复杂的社会现实。

在城乡矛盾尤为尖锐的今天,拨开消费主义、精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妖魔性话语,我们有必要去体谅这个生活在城乡夹缝的群体“各自面临的社会压力、风险和精神困惑……我们还应该善于洞察其中所投射出来的某些可以改良青年生活品质的希望和光亮”^[24]。重新关注文本内外的小镇青年,重新发现这个被遮蔽的主体,他们在城乡之间艰难的流动,消极地说是“留不下

的城市,回不去的家乡”,但正如威廉斯所说:“要让希望具有可行性,不要让绝望具有说服力。”^[25]通过人的流动,以人为中介,是否有可能在日益僵化的城乡二元结构中撑开一道裂隙?果真如此,或许可以对于文化政治与城市经济发展这一问题给出当代的答案,也是一种打破阶层区隔、恢复人群与地域之间普遍联系的伦理与价值回归。

参考文献

- [1]侯隽.“小镇青年”崛起,改变中国观影版图[J].中国经济周刊,2016(2).
- [2]曾世湘.小镇青年渐成电影票房主力军 未来发展三线城市空间巨大[EB/OL].人民网,2016-1-23.
- [3]徐鹏.“小镇青年”与中国电影票房之间的喜和忧——浅析2015年国产电影票房市场[J].北方传媒研究,2016(1).
- [4]饶曙光、尹鹏飞.中国电影新格局与喜剧电影创作[J].民族艺术研究,2016(3).
- [5]尹鸿、孙伊斌.2015年中国电影产业备忘录[J].电影艺术,2016(2).
- [6]尤卡·格罗瑙.趣味社会学[M].向建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3.
- [7]蔡翔.1960年代的文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生活[J].文艺争鸣,2009(8).
- [8]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5.
- [9]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7.
- [10]毛泽东.接见青年团二大主席团时的指示[EB/OL].<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maozedong/1968/index.htm>.
- [11]蔡翔.国家/地方:革命想象中的冲突、调和与妥协[J].当代作家评论,2008(2).
- [12]蔡翔.1960年代的文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生活[J].文艺争鸣,2009(8).
- [13]蔡翔.1960年代的文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生活[J].文艺争鸣,2009(8).
- [14]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N].人民日报,1964-7-14.
- [15]罗瑞卿.真正革命、彻底革命的英雄[A]//载《青年英雄的故事》(续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5:1-3.
- [16]罗瑞卿.真正革命、彻底革命的英雄[A]//载《青年英雄的故事》(续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5:3.
- [17]白烨、雷达、张颐武等.解构小镇青年的精神史[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6-15.
- [18]白烨、雷达、张颐武等.解构小镇青年的精神史[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6-15.

(下转第95页)

的使用扩大化。二是关于利益再分配。此次修改中,对电影作品二次使用的利益再分配进行了规定。问题在于没有规定制片人、作者、表演者、制作者等利益主体间的报酬分配方法,只是笼统提出“协商解决”,另外利益分配的范围界定也不清晰,如编剧、配乐师、导演、摄像师、甚至剪辑人员等,是否都是作者?

著作权法律体系不断在作者、传播者和广大公众使用者三者之间谋求一个利益平衡的格局。既要有利于创造,也要有利于使用,还要有利于保护。但无论如何修改,作者的创作利益都是第一位的,不承认作者的著作权,社会对作品的需求就不可能得到满足,离开作者的创作这一前提来谈著作权的限制没有意义。因而,立法首先考虑为作者在法律上提供充分的保护。但是,对著作权作出适当限制也有必要,否则作者对作品控制的权利越大、控制时间越长,社会(代表绝大多数使用者利益)所需付出的代价就越大。当然,随着新媒体技术不断变革,尤其是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知识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著作权伦理及权利归属等层面将不断面临新挑战,著作权法的修订和完善也应充分考虑其前瞻性和适用性。

参考文献

- [1]刘晶.困境·经验·探索:中国数字版权构建之路[J].国际新闻界,2012(2).
- [2]王亮.“场景+任务”:场景化传播时代新闻出版营销理念变革[J].新闻界,2016(18).
- [3]刘春田.《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是国情巨变的要求[J].知识产权,2012(5).
- [4]刘春田.《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是国情巨变的要求[J].知识产权,2012(5).
- [5]雷群安.版权作品权益分配的利益平衡理论再思考[J].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 [6]陈心歌、李克.我国计算机软件最终用户责任问题的利益平衡[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 [7]S. J. Liebowitz. The Impact on Reprography on the Copyright System, Consumer and Corporate Affairs, Canada, Ottawa, 1981.
- [8]夏颖.出版市场调查的主要内容[J].新闻界,2012(13).
- [9]李芳.门户网站大型体育赛事移动化传播面临的困境解析[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6(3).
- [10]白净.从香港《版权条例》修订看版权刑法保护[J].国际新闻界,2010(10).
- [1]王清.一枝一叶间雀鸣争执何——中国版权制度十年发展综述[J].编辑之友,2012(1).
- [2]邹举.微博版权冲突及其治理[J].国际新闻界,2012(3).
- [3]蒋晓丽、杨珊.大数据时代媒介技术的伦理问责[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7).
- (上接第55页)
- [19]孟登迎.青年文化研究再探讨[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7(2).
- [20]赵月枝.有钱的、下岗的、犯法的:解读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小报故事[J].开放时代,2010(7).
- [21]刘旭.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99.
- [22]刘旭.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2.
- [23]赵月枝、吴畅畅.网络时代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重建?——国家、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政治传播[J].开放时代,2016(1).
- [24]孟登迎.青年文化研究再探讨[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7(2).
- [25]雷蒙·威廉斯.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M].祁阿红、吴晓妹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4(封底).